

功高者危

——《史记》中关于君臣关系的主题

周先民

本文拟通过对《史记》中的“功高者危”的主题的探索，从一个侧面解剖一下君王专制条件下的君臣关系。

1、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（楚怀王）六年，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，破之于襄陵，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，齐王患之。陈轸适为秦使齐，齐王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陈轸曰：“王勿忧，请令罢之。”即往见昭阳军中，曰：“愿闻楚国之法，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？”昭阳曰：“其官为上柱国，封上爵执。”陈轸曰：“其有贵于此者乎？”昭阳曰：“令尹。”陈轸曰：“今君已为令尹矣，此国冠之上。臣请得譬之。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，舍人相谓曰：‘数人饮此，不足以遍，请遂画地为蛇，蛇先成者独饮之。’一人曰：‘吾蛇先成。’举酒而起，曰：‘吾能为之足。’及其为之足，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，曰：‘蛇固无足，今为之足，是非蛇也。’今君相楚而攻魏，破军杀将，功莫大焉，冠之上不可以加矣。今又移兵而攻齐，攻齐胜之，官爵不加于此；攻之不胜，身死爵夺，有毁于楚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。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，此持满之术也。”昭阳曰：“善。”引兵而去。¹

这就是那个著名的“画蛇添足”的故事。楚将昭阳挟破魏之雄兵，欲乘胜而攻齐，其势汹汹，齐王为之震恐。说客陈轸却胸有成竹，仅凭一小小寓言，即令昭阳“引兵而去”。功高应该受赏，陈轸却称其为蛇足，不但不会带来奖赏，反而有“身死爵夺”之危。这似乎不近情理，但昭阳竟信以为真，言听计从。个中奥妙何在？关键就在于这段说辞所揭示出的“功高者身危”的主旨，并非危言耸听，大言欺人，它有着实实在在的令功高者闻而心惊的事实背景。也许，它使昭阳想起了春秋时代文种被杀的前世之事了吧。

2、文种被杀事见《越王句践世家》²。越王句践不能说不是一位有突出才能的君主，他先是惨败于吴，几乎失国，唯“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”，

后来他苦身焦思，卧薪尝胆，“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织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采，折节下贤人，厚遇宾客，振贫吊死，与百姓同其劳”。终于在二十二年后，灭吴雪耻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上将军范蠡和大夫文种可谓功高者矣。范蠡这里不说，只说文种。吴能赦越允和，主要得力于文种的求和外交，使越得以残存；当句践蒙耻沮丧之时，文种讲周文王、晋公子重耳发愤图强事，激励其不屈不挠，兴国报仇；句践此时对文种言听计从，“举国政属大夫种”。文种竭忠尽智，出谋划策，终于成就了句践灭吴雪耻之功。

然而，句践灭吴称霸后，事情却急转直下了。传中写道：

范蠡遂去，自齐遗大夫种书曰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？”种见书，称病不朝。人或谗种且作乱，越王乃赐种剑曰：“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，其四在子，子为我从先王试之。”种遂自杀。

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如果说范蠡用他绝顶的聪明指出了功高者身危这一命运的话，那么，越王句践则用那把逼杀文种的血淋淋的剑，揭开了专制君主在功成之后滥杀功臣的狰狞面目。概括一下，其特征有：

（1）“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”——极端的自私自利，是句践的为人特点。

（2）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——恩将仇报，句践在伦理上是寡廉鲜耻的。

（3）“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，其四在子”——句践对才大功高者，在心理上是极其猜忌的。

（4）“人或谗种且作乱”——用莫须有的“且作乱”，作为诛杀功臣的借口。

既自私自利，又寡廉鲜耻，再加上猜忌心理，同时又有功臣“且作乱”的现成借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功高者的身危，也就是很难避免的了。范蠡凭着绝顶的聪明，及时远走高飞，得以全身避祸；文种稍微迟钝一些，结果遭到了首身分离的下场。

在《史记》中，句践逼杀文种事绝非个别现象，它只是司马迁表现“功高者身危”主题时的一个典型事例，比句践稍早，吴王夫差杀掉了功高者伍子胥³；其后二百余年，战国时又有秦昭王逼杀白起事。

3、秦昭王逼杀白起事见《白起王翦列传》，白起因“善用兵，事秦昭

王”，“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，南定鄢、郢、汉中，北擒赵括之军”，故甚为昭王赏识，自左庶长而大良造，封武安君。如果说秦昭王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是有巨大建树的君主之一，那么白起则是为其攻城略地的第一大功臣。然而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功大即意味着身危，白起却浑然不知。在是否进攻赵都邯郸的问题上，白起基于正确的对军事形势的判断，认为“实未易攻”，故不肯将兵攻邯郸。后秦军果然败于邯郸，而武安君白起也就大祸临头了，传中写道：

秦军多失亡。武安君言曰：“秦不听臣计，今如何矣！”秦王闻之，怒，强起武安君，武安君遂称病笃。应侯请之，不起。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武安君病，未能行。居三月，诸侯攻秦军急，秦军数却，使者日至。秦王乃使人遣白起，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。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：“白起之迁，其意尚怏怏不服，有余言。”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自裁。武安君引颈将自刳，曰：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”良久，曰：“我固当死。长平之战，赵卒降者数十万人，我诈而尽坑之，是足以死。”遂自杀。

武安君白起因对秦昭王的瞎指挥有不同意见，即被其“怒”而革职“为士伍，迁之阴密”，可见秦昭王的专断蛮横；白起因病，“未能行”，“秦王乃使人强行遣白起，不得留咸阳中”其刻薄无情毕显无遗。如果白起不是名将，不是功高者，大概仍然能保全生命。然而白起偏偏是名将，是功高者，所以当秦昭王认为“白起之迁，其意尚怏怏不服，有余言”时，即拔出罪恶之剑，逼而诛之了。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描写秦昭王的心理，但这件事所反映出的秦昭王之自私、无耻、专横、猜忌，与句践是如出一辙的。可怜白起为秦昭王效劳一生，冤死之时，仍不敢指斥君王，只是以自责收场，由此更可以看出封建君王的淫威之酷烈了。

离秦昭王逼杀白起仅半个世纪，汉代又有汉高祖刘邦杀功臣事。

4、先看刘邦杀彭越事。

刘邦能击败项羽，当上汉朝的开国皇帝，彭越功不可没。季布曾概括其功说：

方上（刘邦）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间，项羽所以不能遂西，徒以梁王（彭越）居梁地，与汉合纵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而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

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⁴

彭越立下大功，被封为梁王。他以为睡在功劳簿上，可以高枕无忧、永享清福了，所谓“亦欲传之万世”也。殊不知，功高者身危，猜忌功臣的统治者已经在磨刀霍霍、寻机杀人了。且看下面这段记载：

十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帝自往击，至邯郸，征兵梁王。梁王称病，使将兵诣邯郸。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扈辄曰：“王始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禽矣。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称病。梁王怒其太仆，欲斩之。太仆亡走汉，告梁王与扈辄谋反。于是上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觉，捕梁王，囚之洛阳。有司治反形已具，请论如法。上赦以为庶人，传处蜀青衣。西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欲之洛阳，道见彭王。彭王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东至洛阳。吕后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。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。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。上乃可，遂夷越宗族，国除。⁵

彭越被灭族与白起被逼杀的起因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他因为未能亲自将兵诣邯郸援助高帝，就引得“高帝怒，使人让梁王”。梁王因此大恐，不知所措，想去向高帝谢罪，又不敢；其将扈辄劝他谋反，被拒绝。由此可以想见，彭越对高帝的恐惧以及希望继续效忠于高帝的心情。然而猜忌心极重的高帝，却抓住了这个口实，下毒手了：“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觉，捕梁王，囚之洛阳”。猛将彭越毫无反意是一目了然的，否则不可能在自己国内，对刘邦使者毫无戒备，束手就擒。但刘邦并不因此放过他，而是将他削王为民，并流放偏远的蜀地。彭越自度无罪，所以在流放途中遇吕后时，“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”。彭越的这个请求是极卑微的，明明是蒙冤，却不敢辨明，而只是要求惩罚稍轻一些。在封建皇帝的淫威之下，功臣的心境就是这样可怜。如果他是一般功臣，则完全可能被接受。偏偏他是“壮士”，是功高者，强烈的猜忌心使统治者恐“自遗患”。于是吕后用极卑鄙的阴谋手段先是“许诺”，将其骗至洛阳，然后“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。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。上乃可，遂夷越宗族，国除”。高帝夫妻就这样卑鄙无耻地合谋合力杀害了功高者彭越。比起白起，彭越的下场似更悲惨：一是直接被统治者陷害，强加上“谋反”冤罪。二是被满门抄斩，受害面更大。由此可见，刘邦、吕后对待功高者，比起前辈，是更加加毒残酷的。

“夷越宗族”并非刘邦、吕后对待功高者的的第一个罪恶勾当，在彭越之

前，还有更早的牺牲品韩信。

5、韩信被诛事见《淮阴侯列传》。韩信是楚汉之际最杰出的军事统帅，为刘邦南征北战，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其盖天下之功，计其大者，则如传中蒯通所言：“涉西河，虏魏王，擒夏说，引兵下井陘，诛成安君，徇赵，胁燕，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，东杀龙且。”在彻底消灭项羽的“垓下之战”中，韩信率三十万大军作为主力，从正面进攻项羽，功劳亦最大。可以说，若无韩信之力，刘邦之成功将遥遥无期。

大功之外，韩信对刘邦又曾有着大忠。辩士蒯通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，曾劝韩信反汉自立，其言曰：“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己己，亦误矣。大夫种、范蠡存亡越，霸句践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。野兽已尽而猎狗亨。……以忠信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、范蠡之于句践也。此二人者，足以观矣。愿足下深思之。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……今足下戴震主之威，携不赏之功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：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窃为足下危之。”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蒯通所言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根据历史教训、刘邦为人，对功高者韩信处境的正确判断。精明如韩信者对此段说辞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但是，韩信感于刘邦重用自己的知遇之恩，抱定“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”的信念，宁愿当忠者而不当智者，谢绝了蒯通的建议。

然而，大功之下，其实难居。刘邦借韩信之力取得天下后，对勇略震主、功盖天下的韩信的猜忌日甚一日，是必欲除之方心安的。机会很快就找到了：

汉六年，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。高帝以陈平计，天子巡狩会诸侯，南方有云梦，发使告诸侯会陈：“吾将游云梦。”实欲袭信，信弗知。高祖且之楚，信欲发兵反，自度无罪，欲谒上，恐见擒。人或说信曰：“斩昧（项羽亡将，刘邦敌，韩信友，匿在信处）谒上，上必喜，无患。”……信持其首，谒高祖于陈，上令武士缚信，载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‘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’天下已定，我固当亨！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械系信。至洛阳，赦信罪，以为淮阴侯。

很显然，“人告公反”，只是栽赃蓄意陷害，刘邦“实欲袭信”，才是真实愿望。可怜韩信，为刘邦所逼，欲反而实未反，故“自度无罪”。因而对刘邦的罪恶阴谋先是毫无察觉，浑然“弗知”；待祸即临头时，又急忙逼杀己友，

“持其首，谒高祖于陈”，以为借此行动，就能表示自己的忠心，消除刘邦的误会。其实，韩信的功高才大，即是最大的罪名，是刘邦心中无法消除的隐痛。虽然，刘邦这次并没有立刻杀掉韩信，以削王为侯收场，但是，这种无端的凌辱、迫害，已使韩信认清了刘邦的真实面目，看到了自己的必然命运：

“‘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’天下已定，我固当亨！”于是，

信知汉王畏恶其能，常称病不朝从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，羞于绛、灌等列。

他“怨望”汉王的恩将仇报，没有良心，他“鞅鞅”于自己的忠而被疑，无端受辱。如果说，韩信以往的耿耿忠心，被此时的“日夜怨望”与“居常鞅鞅”所取代，而逐渐萌生谋反之心的话；那么，这也是刘邦侮辱、逼迫的结果，应属于君逼臣反的性质。传中又详细记录了韩信与钜鹿守陈豨勾结，谋反而被诛的经过：

汉十年，陈豨果反。上自将而往，信病不从。阴使人至豨所，曰“弟举兵，吾从此助公。”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，欲发以袭吕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于信，信囚，欲杀之。舍人弟上变，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就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贺。相国给信曰：“虽疾，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，斩之长乐钟室。信方斩，曰：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遂夷信三族。

这段记录疑点很多：其一，官徒奴力量微不足道，善度时势如韩信者，当不会如此鲁莽行事。其二，既然陈豨已反，且韩信业已派人“至所”约束已定，为何仍要“待报”而坐失良机？其三，韩信在“欲发以袭吕后、太子，部署已定”的情况下，不大可能轻易奉可疑之诏，上门就擒。关于韩信是否谋反，梁玉绳辩之甚有力焉：

信之死冤矣！前贤皆极辨其无反状，大抵出于告变者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。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，而其冤自见。一饭千金，弗忘漂母，宁负高皇；不听涉、通于拥兵王齐之日，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；不思结连布、越大国之王，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；……上谒入贺，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；家臣徒奴，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？是知高祖畏恶其能，非一朝夕，胎祸于躐足附耳，露疑于夺符袭军，故擒缚不已，族诛始快，

…… 6

要之，韩信在统治者逼迫之下，欲反而实未反，统治者“畏恶其能”，故罗织罪名，诸而族之。其具体经手人是吕后，但刘邦绝对逃不脱干系。传中写韩信被吕后杀后，紧接着写道：

高祖已从豨军来，至，见信死，且喜且怜之。

司马迁用“且喜且怜”四个字描写刘邦“见信死”时的心理状态，非常传神：打下天下的一代豪杰，未死于战场上的敌手，却横尸于所效力的主子的刀下，其状惨，其情冤，不能不使刘邦砰然心动，有所怜惜。但是，怜惜只是瞬间，大“喜”才是主要的心态，劳苦功高的心腹大患终于被除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当然要心花怒放了。不妨设想，如果他并不欲诛韩信，而竟被吕后擅自杀害，他此时的心态就不会是“且喜且怜”，而应该是“且怒且怜”了。

6、为刘邦打下天下的三位功高盖世的名将，除韩信、彭越外，还有一个英布。韩信和彭越先后无辜被诛，使另一个功高者英布极为震恐，因担心被诛而先反了。其事载《鲸布列传》。英布姓英，因曾坐法鲸，故又称鲸布。英布原为项羽的大将，后从随何之说，倒戈助汉，“举九江兵与汉击楚，破之垓下”，因功封淮南王。功名成就，英布心满意足，安分守己，忠于汉室：

七年，朝陈。八年，朝洛阳。九年，朝长安。

然而，在高祖十一年，英布却突然谋反作乱了：

十一年，高后诛淮阴侯，布因心恐。夏，汉诛梁王彭越，醢之，盛其醢遍赐诸侯。至淮南，淮南王方猎，见醢，因大恐，阴令人部聚兵，候伺旁郡紧急。

这时，淮南王与中大夫贲赫发生矛盾，“欲捕赫”。于是，

赫言变事，乘传诣长安。布使人追，不及。赫至，上变，言布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诛也。……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，上变，固已疑其言国阴事；汉使又来，颇有所验，遂族赫家，发兵反。

统治者恩将仇报杀功高者彭越后，又滥施淫威，将彭越尸体“醢之（作成肉酱）”，“盛其醢遍赐诸侯”。结果使得一向循规蹈矩的淮南王“因大恐，阴令人部聚兵，候伺旁郡紧急”，准备谋反了。这时又发生了贲赫告状事，终于促成了淮南王的“发兵反”。对于淮南王谋反原因，汝阴侯滕公曾召故楚令尹问之。

令尹曰：“是固当反。”滕公曰：“上裂地而王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南面而立万乘之主，其反何也？”令尹曰：“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此

三人者，同功一体之人也。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”⁷

很清楚，刘邦统治集团残暴无耻、诛杀功臣的作法，不但未能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，而且使得功臣人人自危，胆战心惊，导致了新的动乱。英布本无反心，因担心被诛而铤而走险，反叛朝廷，企图先发制人，结果造成了新的灾难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。英布的谋反，实际上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，揭露了刘邦统治集团谋杀功臣的罪恶。

以上我们分析了《史记》所叙述的刘邦统治集团诛灭韩信、彭越、英布这三个功臣的大致过程。袁黄说：“文种佐句践灭吴，吴灭而种诛；韩信佐汉高亡楚，楚亡而信族。龙准亦鸟喙之雄哉！”⁸在杀功臣方面，袁黄把刘邦与句践相提并论，是一针见血的。刘邦紧步句践之后尘，极端自私自利，厚颜无耻，猜忌功臣，屠杀功臣，用心更狠毒，手段更狡猾，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问题还在于，作为开国皇帝，刘邦的滥杀功臣，给其继承人带来了恶劣影响，从此，猜忌和迫害功臣，成了刘氏政权的统治家法，而被一代代传下去了。让我们来看文帝和景帝吧。

7、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以仁爱著称，但他对待功高如周勃者，却没有丝毫的仁爱可言。

周勃事载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。周勃早年佐助刘邦击秦、灭楚，因功封绛侯。刘邦死后，吕后积极扶植吕氏势力，刘氏政权风雨飘摇。周勃身为掌兵权的太尉，在诛吕安刘之役中立有殊功。可以说，刘邦之中子代王刘恒能被立为皇帝，周勃功居第一。于是，

文帝既立，以勃为右丞相，赐金五千斤，食邑万户。

从表面上看，文帝赐功高者周勃以尊位、以重权，似在真心感激周勃的拥立之功。周勃也准备居功享福了。其实好景不长。

居月余，人或说勃曰：“君既诛诸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君受厚赏，处尊位，以宠，久之即祸及身矣。”

前车之鉴，后世之师，“木强敦厚”的周勃，大概记起了刘邦朝功高者接连被杀的教训，感到了功高震主的危险。因此，

勃惧，亦自危，乃谢请归相印。上许之。

妙在周勃张口一提辞官，文帝就一口答应，可见对周勃是早有戒心了，由此可以推知一个月前文帝“以勃为右丞相”亦非出于真心。想来周勃在辞官获准之后，不会不心有余悸，从而想远离官场了吧。然而，这只是周勃的一厢情愿。

且看事情如何发展：

岁余，丞相平卒，上复以勃为丞相。十余月，上曰：“前日吾诏列侯就国，或未能行，丞相吾所重，其率先之。”乃免相就国。

文帝颐指气使，反复无常：先是一口答应周勃辞相；岁余后，又要其复相；复相后十余月，又令其免相就封邑，等于硬罢了周勃的官。老实厚重的周勃，先是愿为相，因恐祸而不得不辞相；后来不敢为相，因奉旨又不得不为相；最后竟莫名其妙地被罢了相：完全被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处于不由自主、祸福难测的境地。文帝对周勃的升迁无常，大约有宣示自己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用意。从这点说，文帝的目的是达到了，怀着对文帝的恐惧，周勃免官家居时亦惶惶不可终日：

岁余，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，绛侯周勃自畏恐诛，常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

周勃这位出将入相的元老重臣，何以如此神经过敏，庸人自扰如乡下儿女子？此无它，不过是由于有一段功高震主的历史，饱尝了文帝的猜忌、折磨，导致了丧魂失魄罢了。其实，他的功高之罪，又岂是躲能躲得掉的，大祸从天而降了：

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，下廷尉。廷尉下其事长安，逮捕勃治之。勃恐，不知置辞。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狱吏，狱吏乃书牍背示之，曰“以公主为证”。公主者，孝文帝女也，勃太子胜之尚之，故狱吏教引为证。勃之益封受赐，尽以予薄昭。及系急，薄昭为言薄太后，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，太后以冒絮提文帝，曰：“绛侯馆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邪？”文帝既见绛侯狱辞，乃谢曰：“吏方验而出之。”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，复爵邑。绛侯既出，曰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贵乎！”

有人诬告周勃欲反，对文帝来说是正中下怀，于是立即交给廷尉追究，“逮捕勃治之”。周勃没有反心，更没有反事是确实的，但在淫威之下竟“不知置辞”。若不是有个儿媳是文帝之女，借其作证；若不是平时“益封受赐，尽以予薄昭（薄太后之弟、文帝之舅）”，此时得其力“为言薄太后”；若不是薄太后凭借太后之尊为勃辩冤：周勃的脑袋搬家大概是难免的了，也就是说，功高者周勃所以能够死里逃生，不是文帝动了恻隐之心，幡然改过，而是碍于母太后情面不得不如此罢了。

8、《绛侯周勃世家》后半写了周勃之子周亚夫。上节说过，文帝对周勃极为猜忌，几乎置其于死地。但对其子条侯周亚夫却是信任有加。亚夫以河内守身份为将军，驻军细柳以备胡。文帝前往劳军，亚夫军纪严明，先是“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”；接着文帝车骑至，又规定“军中不得驱驰”；当文帝“至营”时，“将军亚夫持兵揖曰：‘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’”对此，文帝不但不以为杵，反而“称善者久之”，赞叹亚夫为“真将军”，并将其擢升为中尉。文帝临死时又嘱咐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可真任将兵。”对亚夫的信任可谓始终如一。

文帝对周勃父子的态度为何有天壤之别？关键就在于周勃是先朝重臣，对文帝亦有拥立大功，其功盖一朝，德高望重。故文帝生怕其起来造反，因而百般刁难、迫害，猜忌不休，欲置于死地方心安。所以功高者周勃在文帝一朝始终面临着被杀头的危险。而周亚夫，则是文帝从周勃诸子中亲自挑选出来，续绛侯之后，封为条侯的。其对文帝无功，倒是文帝对其有恩。所以文帝不但不担心亚夫恃功造反，反而一直指望亚夫感恩图报。同时，文帝朝始终面临着匈奴的严重威胁，十分需要周亚夫这样的“真将军”保卫国家。狡兔未死，走狗不烹，文帝对亚夫始终信任，主要原因就在这里。

文帝死后，景帝刘启继位。他遵从其父遗嘱，重用周亚夫。周亚夫竭忠尽智，率军平定了吴、楚七国之乱，保卫并巩固了景帝的江山，立了大功。过了几年，周亚夫又当了丞相。与此同时，周亚夫在景帝的心目中也就成了必须防范的对象。这是因为，周亚夫是先朝重臣，资格老；又为景帝平定反叛，功劳大；同时又身为丞相，地位高。皇帝的逻辑就是这么奇怪，谁为自己立下的功劳大，就把谁当作自己的敌人。而周亚夫对景帝的这种心理变化毫无察觉，凭忠勇率直之性，对朝廷举措仍然是直谏敢言；暗中猜忌、防范周亚夫的景帝，自然把这种谏诤当成对自己的不尊重，是摆老资格。同时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，因战略需要，曾“以梁委之，绝其粮道”，梁国因此损失惨重，从而得罪了梁孝王；梁孝王每次进朝，都要对宠爱他的太后讲亚夫的坏话，太后因此也忌恨亚夫。这样，功高的周亚夫等于坐到了火山口上。一次，景帝欲封匈奴降将唯徐庐等五人为侯，周亚夫谏之，被景帝严厉拒绝。周亚夫此时似乎察觉到某种危险，赶快急流勇退，“因谢病”。景帝抓住机会，“因病”免了周亚夫的丞相。至此，景帝对周亚夫的迫害拉开了序幕。

顷之，景帝居禁中，召条侯，赐食。独置大 ，无切肉，又不置 。

条侯心不平，顾谓尚席取 。景帝视而笑曰：“此不足君所乎？”条侯免

冠谢。上起，条侯因趋出。景帝以目送之，曰：“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！”

景帝赐食，亚夫不敢不来；而景帝只准备了大块肉，又故意不给筷子。显然是有意在捉弄、侮辱亚夫。如果亚夫毕恭毕敬，小心应付的话，或许景帝找不到碴。偏偏亚夫不小心流露出一点“不平”，蓄意制造事端的景帝立即露出了杀机：“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！”

居无何，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五百被可以葬者。取庸苦之，不予钱。庸之其盗买县官器，怒而上变告子，事连污条侯。书既闻上，上下吏。吏簿责条侯，条侯不对。景帝骂之曰：“吾不用也。”召诣廷尉。廷尉责曰：“君侯欲反邪？”亚夫曰：“臣所买器，乃葬器也，何谓反邪？”吏曰：“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”吏侵之益急。初，吏捕条侯，条侯欲自杀，夫人止之，以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。因不食五日，呕血而死。国除。
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景帝除亚夫之心早存，一旦有隙可乘，即置之死地。“欲反地下”，固然荒谬绝伦；但是，“谁功劳大就杀谁”的皇帝之逻辑，不更加荒唐吗？

9、当然，《史记》中也写了一些成功的全身避祸的功高者，考察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将是很有意义的。

我们先看与文种同时的范蠡。《越王句践世家》记其功云：

范蠡事越王句践，既苦身戮力，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，竟灭吴，报会稽之耻，北渡兵于淮以临齐、晋，号令中国，以尊周室，句践以霸，而范蠡称上将军。

范蠡“苦身戮力，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”，使句践灭吴称霸，可谓劳苦功高者矣。且看他如何对待己功：

范蠡以为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，难与处安，为书辞句践曰：“臣闻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昔者君王辱于会稽，所以不死，为此事也。今既已雪耻，臣请从会稽之诛。”句践曰：“孤与子分国而有之，不然，将加诛于子。”范蠡曰：“君行令，臣行意。”乃装其轻宝珠玉，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反。

范蠡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深刻认识到句践“可与同患，难与处安”的绝对自私的本质，清醒预见到“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”的功高者的危险，从而“浮海以

行，终不反”，坚决走上了功成身退的道路，终于得以避祸全身。

范蠡的功成身退，是退避山野，汉初的张良效法前贤，亦走上功成身退之道，不过不是退避山野，而是养生学道。

张良事见《留侯世家》。刘邦曾盛赞其功曰：“运筹策帟帐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功也”⁹；并且自认为在这方面“不如子房”¹⁰。确实如此，张良作为刘邦的军师，以百战百胜之计，多次挽狂澜于既倒，使刘邦化险为夷，走向胜利。其功名与韩信、萧何并列，被誉为“汉初三杰”。不过，他似乎比另外两杰更清楚刘邦统治集团的本性，更清楚功高者的危险，因而有预见性地采取了种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。

首先是辞功让封。当刘邦平天下，封功臣，让张良“自择齐三万户”受封时，张良说：“始臣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中，臣愿封留足矣，不敢当三万户”。不是恃功求封，而是辞功让封，故意抹杀自己的作用，将一切功劳归于刘邦，归于天意，谦让恭敬如此，刘邦又从何猜忌起呢？

其次是隐身学道，避开世事。当张良随刘邦入关后，“即道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岁余。”张良的理由是“多病”，这也许是事实，但此时多病却正合张良心意，他正好借病发挥，“杜门不出岁余”，避免在政坛出头露面。后来他又说：“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封万户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于良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这段话，一是表示自己心满意足，没有野心；二是表明愿弃世远游，对政事毫无兴趣，从而从根本上打消了统治者可能产生的疑虑。何况他又确实付之于行动：“学辟谷，道引轻身”。自然也就得善终了。

俗话说：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然而象范蠡、张良这类与君王共患难、为君王打江山的大功臣，则不敢在功成后与统治者分享胜利果实，并且避之唯恐不及。此无它，统治者自私、无耻、猜忌的本性猛如虎也。功成若不身退，身家性命难保。也就是说，范蠡之属的功成身退并非单纯出于只管耕耘、不问收获的清风亮节，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，是清醒认识到功高者的危险而不得不然也。

10、与范蠡、张良不同，王翦、萧何是全身避祸的另一类功高者。王翦事载《白起王翦列传》。王翦“少而好兵，事秦始皇”，传中言其功曰：“始皇十一年，翦将攻赵阨与，破之，拔九城。十八年，翦将攻赵。岁余，遂拔

赵，赵王降，尽定赵地为郡。明年，燕使荆轲为贼于秦，秦王使王翦攻燕。燕王喜走辽东，翦遂定燕蓟而还。”可见王翦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战功最著者。后来秦将李信攻荆失利，秦始皇固请王翦率六十万秦兵以平荆。

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，始皇自送至灞上。王翦行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。始皇曰：“将军行矣，何忧贫乎？”王翦曰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向臣，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。”始皇大笑。王翦既至关，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。或曰：“将军之乞贷，亦已甚矣。”王翦曰：“不然。夫秦王怙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，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，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？”

百战百胜的老英雄，领军即发之际，竟趁机向始皇“请美田宅园池甚众”；当始皇追问其“何忧贫”时，则赤裸裸地申明是“为子孙业”；率军出发后，又“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”。如此可怜与贪婪，惹得“始皇大笑”。始皇笑什么呢？大概是笑王翦这个老将军本领虽大，目光却浅；功劳虽高，要求却低。自然，那颗绷紧着的猜忌功臣之心，也随着这笑声松弛下来了。当然，这笑声又是带有侮辱性的，是在嘲笑王翦这个老将军不要人格尊严，是个老糊涂。然而，人格的受辱却可换来性命的安全，两弊相权取其轻，不得已，为了防止“秦王坐而疑我”，老将军也只好用自泼污水的办法，“多请子孙业以自坚”了。

无独有偶，秦将王翦之后又有汉相萧何。萧何事载《萧相国世家》。萧何是刘邦同乡，与刘一起在沛下起事，在反秦、灭楚的斗争中功居第一。关内侯鄂君对高祖言萧何之功云：

夫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常失军亡众，逃身遁者数矣。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非上所诏令召，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。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军无见粮，萧何转漕关中，给食不乏。陛下虽数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11

刘邦也认为萧何居功至伟，他曾慨叹说：

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12

这自然是实话。萧何作为臣下，才大功高到皇帝都自叹不如的程度，这功劳所带给萧何的，就不仅仅是光荣和利益，而且是威胁和危险了。因为这功劳带给皇帝的猜忌，远远压倒了对功臣的感激。在这情形下，功臣要想避祸全身，实在是极其困难的。且看萧何是如何面对刘邦猜忌的惊涛骇浪的吧。

汉三年，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，上数使使劳苦丞相。鲍生谓丞相

曰：“王暴衣露盖，数使使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为君计，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，上必益信君。”于是从其计，汉王大说。这是第一个回合。尚在楚、汉悉斗之际，汉王的猜忌活动就开始了。萧何若不是用鲍生计，“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”以示忠心的话，其前景如何，难以预测。汉王因萧何的效忠而“大说”，化疑为喜，萧何度过了第一个难关。

汉十一年，陈豨反，高祖自将，至邯郸。未罢，淮阴侯谋反关中，吕后用萧何计，诛淮阴侯，……上已闻淮阴侯诛，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，益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，……召平谓相国曰：“祸自此始矣。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，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，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，疑君心矣。夫置卫卫君，非以宠君也。愿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军，则上心说。”相国从其计，高帝乃大喜。这是第二个回合。韩信是萧何所荐大将，有百战百胜之功，但萧何为自保，竟献计，“诛淮阴侯”。这是萧何人格上的污点，但亦有不得已之处，因为他本人亦处在严重的猜忌之中，对这种有关谋反的敏感事件，处理稍不果断，即很可能被株连杀戮。实际上尽管萧何以出卖韩信来效忠，刘邦仍然有疑忌之心。萧何若不是用召平计，“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军”，应对得当，刘邦的“大喜”，当被“大疑”、“大怒”所取代了。

汉十二年秋，鲸布反，上自将击之，数使使问相国何为。相国为上在军，乃拊循勉力百姓，悉以所有佐军，如陈豨时。客有说相国曰：“君灭族不久矣。夫君位为相国，功第一，可复加哉？然君初入关中，得百姓心，十余年矣，皆附君，常复孳孳得民和，上所为数问君者，畏君倾动关中。今君胡不多买田地，贱贖贷以自污？上心乃安。”于是相国从其计，上乃大说。

这是第三个回合。萧何在汉高帝自将击鲸布时，一如既往，出于爱民忠君本性，“乃拊循勉力百姓，悉以所有佐军”，以此示好于高帝。然而却遭到了当头棒喝：“君灭族不久矣！”因为其善举，在善疑的高帝眼中，有“倾动关中”之嫌。于是萧何只好用客计，违拗爱民之本性，大做损民之勾当：“多买田地，贱贖贷以自污”。这才又一次化险为夷，博得高帝的“大说”。

然而此事并没有完。

上罢布军归，民道遮行上书，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。上至，相国谒。上笑曰：“夫相国乃利民！”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，曰：“君自谢

民。”相国因为民请曰：“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，愿令民得入田，毋收彘为禽兽食。”上大怒曰：“相国多受贾人财物，乃为请吾苑！”乃下相国廷尉，械系之。

刘邦猜忌萧何，恐其深得民心，倾向关中。所以当百姓控告“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”时，刘邦是喜不自胜的，因为这表明萧何已失掉民心，不足畏也。于是“上笑曰：‘夫相国乃利民！’”然而萧何却愚钝得很，以为高帝真存“利民”之心，故乘机为民请上林空地。谁知“利民”之请，恰恰触犯了高帝的大忌，他立即穷凶极恶地“下相国廷尉，械系之”，意欲诛之了。这一事件，是刘邦蛮横无耻、长期以来猜忌萧何心理的总爆发。虽然，萧何后得他人之力，辩明其冤，终于蒙赦出狱，然而统治者对他的猜忌、迫害，使他没齿难忘了。

该传最后留下了以下几句话：

何置田宅必居穷处，为家不治垣屋。曰：“后世贤，师吾俭；不贤，毋为势家所夺。”

这一方面是说明萧何生性俭约谨慎，由此可以反观其强行贱买百姓田宅以自污避祸，是怎样践踏了自己的人格尊严，违背了自己的本性。另一方面也表明，萧何虽贵为丞相，但对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皇帝有无比的恐惧，随时都可能受到意想不到的迫害，既然易“为势家所夺”，又何必苦心经营？

在如何避祸全身这个题目下，王翦、萧何总算做成功了，但成功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。自古以来，士所信奉的传统是“可杀不可辱”。然而，王翦这个身经百战的老英雄，却不得不扮演市井商贩的角色，以讨价还价般地“乞贯贷”，自污人格，以避免秦始皇的猜忌；萧何这个忠智贤仁的名丞相，却不得不充当傀儡小人，献计诛灭名将韩信以避嫌，欺压百姓自毁名誉以自救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无辜遭受了幽囚之辱，哪里还有独立的人格可言？这样的功高者，肉体虽存，精神却完全被摧毁了，不过是以小心翼翼的苟活，图个全尸罢了。由此我们又发现了，所谓“功高者危”，不仅是指功高者易招来生命的危险；而且还意味着有丧失人格的危险。

11、以上我们通过列举《史记》中的大量事实，讨论了功高者所面临的重重危险。归纳起来说，这是司马迁用思想家的慧眼、艺术家的匠心，深刻描绘出的旧时代君臣之间的一个方面的关系图式。

图式的中心是君，他们占有一切，主宰一切，生杀予夺，为所欲为。绝对

的权力造就了绝对的蛮横，绝对的占有造就了绝对的自私。于是他们用绝对蛮横、绝对自私的心理去揣度为自己打下江山的功高者，生怕功高者们反戈一击，推翻自己的统治。因而他们对功高者虎视眈眈，猜忌不断，迫害不止，杀之而后快。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，他们出尔反尔，恩将仇报，根本没有信义可言，没有伦理可讲，没有人性可谈！“兔死狗烹”，常常被他们认作天经地义的统治法则；“功臣欲反”，恰恰是他们诛杀功臣的最好借口。

君的周围是有功的群臣。在为君打天下时，他们曾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功勋累累，各领风骚。然而当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获得成功、他们为之效力的领袖夺得江山后，他们的人生却急转直下了，劳苦功高的历史一方面带给他们得官封侯的荣耀，一方面又为他们贴上了易招猜忌的醒目标签，使他们伴君如伴虎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动辄得咎，生命和心理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：或无辜被诛，如文种、白起、韩信、彭越、周亚夫等；或幽囚被辱，如周勃；或自污人格，隐忍苟活，如王翦、萧何。既没有了生命的保障，又失去了做人的尊严，这就是极端专制制度下的功高者们的悲惨处境，这就是司马迁通过“功高者危”的主题，揭示出的在某些君臣之间存在着黑暗关系。

在这种毫无平等可言的黑暗的君臣关系的压迫之下，那些个性强悍、不甘屈服的功高者如英布之流，图谋揭竿而起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，统治阶级内部之所以政变不断，君逼臣反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中国古代士人们之所以企羡范蠡、张良的清高，往往将“功成身退”当作最高的人生理想，并非单纯出于所谓清风亮节，而是由于黑暗君臣关系的官场现实所逼迫，是明哲们保护生命、保卫人格的明智选择。

12、我们上面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越王句践、秦昭王、汉高祖、文帝、景帝因猜忌功臣，而折磨、诛杀功臣的罪恶事实及其影响，概括了司马迁通过“功高者危”的主题，对存在于君臣之间的某种黑暗关系的深刻揭露。在结束本章之前，还想匆匆补充一点：

司马迁对“功高者危”主题的表现是多侧面的，不仅充分揭露了统治者直接迫害功高者的罪行，而且还展示了功高者所面临的另外两大危险：一是来自奸臣、小人，奸臣、小人们出自妒忌功臣的阴暗心理，或向统治者进谗言，无耻中伤功高者；或者直接进行伤害功高者的活动，比如《司马穰苴列传》中所

写的“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”的司马穰苴，因功高被“尊为大司马”，结果，“大夫鲍氏、高、国之属害之，谮于景公。景公退穰苴，苴发疾而死”。再如《孙子吴起列传》里所写的“善用兵”、“甚有声名”的吴起，将魏，被丞相公叔设计害之；相楚，又被宗室大臣作乱射杀。

功高者的另一个危险是来自敌对势力。国家外部的敌对势力对于功高才大的对手，自然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们利用统治者对功臣的猜忌心理，千方百计，大行反间计，于是功高者又纷纷落马。在这方面，典型者有战国时的乐毅、魏公子无忌、李牧等人。乐毅事见《乐毅列传》。乐毅曾率燕军攻齐而大胜之，“下齐七十余城”。这时，齐之田单，“乃纵反间于燕”。“燕惠王固已疑乐毅，得齐反间，乃使骑劫代将，而召乐毅。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，畏诛，遂西降赵。”很明显，齐之反间之所以得逞，是因为“燕惠王固已疑乐毅”。乐毅因功高被疑、被逼走，固然很不幸；但迫害功高者的统治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：“齐田单后与骑劫战，果设诈诳燕军，遂破骑劫于即墨下，而转战逐燕，北至河上，尽复得齐城”，也算是咎由自取了。魏公子无忌事载《魏公子列传》。魏公子是魏安厘王异母弟，被封为信陵君。魏公子保卫祖国，窃符救赵，率五国之兵大破秦军，建立了“威振天下”之功。于是，“秦王患之，乃行金万斤于魏，求晋鄙客，令毁公子于魏王”。“魏王日闻其毁，不能不信，后果使人代公子将。公子自知再以毁废，乃谢病不朝，与宾客为长夜饮，饮醇酒，多近妇女。日夜为乐饮者四岁，竟病酒而卒。”魏公子与乐毅一样，因战功使敌国胆寒，“秦王患之”，而行反间计于魏王，因而被魏王怀疑、撤职。区别仅在于：乐毅并非燕人，故去燕往赵得以寿终；魏公子热爱祖国而无去国之心，故只能以流连酒色排遣郁闷。“病酒而卒”。秦因此坐收渔利：“秦闻公子死，使蒙骜攻魏，拔二十城”。魏自毁良将，又是自食苦果。李牧事附于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。赵将李牧，曾“大破秦军”，因功封武安君。秦欲攻赵，李牧是最大障碍。于是“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，为反间”。赵王立即中计，除去李牧军权，继而又斩之。作为必然结果，“王翦因急击赵，大破杀赵葱，虏赵王迁及颜聚，遂灭赵。”赵王杀功臣，落得个身虏国灭的可悲下场。

以上自乐毅至李牧三人，都是战国名将，战胜攻取，军功卓著，使敌国震恐。敌国于是大行反间之计，企图借刀杀人。计虽毒，但合乎逻辑。燕惠王、魏安厘王、赵王迁虽国别不同，但对于敌国的反间都是言听计从，以自灭良将、自毁长城为快，而且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后果。何以如此愚蠢？其逻辑

根据何在？关键就在于这些统治者对功高的良将，总存猜忌之心，而且这种猜忌随着功高者的继续立功而益甚；因而一旦听到流言蜚语，即笃信不疑，除去功高者方能心安。反间计正是巧妙利用了统治者的上述心理而大收其效的，在战国之间长期的兼并战争中，反间计能成为长盛不衰、百战百胜之计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由此看来，在封建社会里，作为一个功高者，同时面临着统治者的直接杀害、奸佞小人的谗言伤害、敌对势力的反间陷害这三重危险，欲求善始善终，岂不难哉？

由于本章的重点是通过分析统治者直接迫害功高者的罪恶，讨论《史记》所表现的旧时代的重要社会关系即君臣关系的问题，所以对功高者所面临的后二种危险，就不做具体剖析了。

注释：

1、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1721-1722页。下面凡出自《史记》者皆只注篇名，请谅解。

2、以下凡引自所举传中之引文，均不注明具体页数，请谅解。

3、吴王杀伍子胥事详见《伍子胥列传》，请参看，这里从略。

4、《季布栾布列传》引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734页。

5、《魏豹彭越列传》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594页。

6、见《史记志疑》卷三十二，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版第1333页。

7、《鲸布列传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604页。

8、凌稚隆辑校、李光缙增补、日本有井范平补标的《补标史记评林》卷之九十二《淮阴侯列传》第八页引，台湾兰台书局影印本1968年版。

9、《留侯世家》引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042页。

10、《高祖本纪》引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381页。

11、《萧相国世家》引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2016页。

12、《高祖本纪》引，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4年版第381页。